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項目

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九五"規劃研究項目

宋代語言研究

李文澤 著



綫裝書局

宋代語言研究

李文澤 著

綫裝書局

2001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宋代語言研究/李文澤著. —北京: 綫裝書局, 2001. 7
ISBN 7—80106—113—6

I. 宋... II. 李... III. 漢語—研究—宋代 IV.
H109. 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38826 號

書 名: 宋代語言研究

著作責任者: 李文澤 著

責任編輯: 任夢強

特約編輯: 尹 波

封面設計: 王蓉貴

標準書號: ISBN 7—80106—113—6/H·4

出版者: 綫裝書局

地 址: 北京市朝陽區春秀路太平莊 10 號 100027

排版者: 四川文瀾電子出版制作中心

印刷者: 四川省計劃生育宣傳教育中心彩印廠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大 32 開本 14.25 印張 360 千字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 1—1000

定 價: 52.00 圓

導 言

一、漢語史上的宋代語言

所謂宋代語言是指與中國歷史上的宋朝大致同時期的漢民族語言，我們界定其時間跨度為公元 10 世紀六十年代末至 13 世紀八十年代，大約三百年時間。

公元 960 年，五代後周將領趙匡胤在陳橋驛（今河南開封東北）發動兵變，黃袍加身，取代了年僅幾歲的周恭帝，成為宋朝開國之君，是為宋太祖。宋太祖及其繼承人隨後又逐漸削平十國的封建割據，建立起疆域縱橫跨千里的大一統國家。歷九代皇帝，至靖康元年（1126）女真軍隊入侵宋，攻占了宋的都城汴梁（今河南開封），俘獲了宋徽宗趙佶、宋欽宗趙桓，宋朝前期的統治滅亡。宋朝皇室南遷，康王趙構在江南重建朝廷，以臨安（今浙江杭州）作為京城，延續了宋王朝統治的命脈。歷史上以“靖康”為界，將宋劃分為北宋、南宋兩段。南宋在江南的統治又持續了一百年，北方的蒙古部族強盛起來，攻滅了女真族建立的金國，繼而又攻陷南宋都城臨安，年幼的宋恭帝被俘北上，另一個幼兒皇帝趙昀遭蒙古軍追剿，于 1279 年在厓山（今廣東新會南）兵敗，被大臣陸秀夫背負着投海自盡，宋王朝的統治宣告結束。

宋朝的統治前後歷時三百年，中間除了北、南更替時的大規模戰亂以外，其餘時期大多都處於相對統一安穩的時期，這為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極好的條件。歷來的研究者都認為，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巔峰，無論政治、經濟、思想、文化、

科技諸方面都有着空前巨大的成就。我們同時還注意到，伴隨着社會經濟文化的高度發達，作為人們思想文化交流工具的語言在這一時期也顯得異常活躍，呈現出飛速發展的勢頭。我們只要將宋代語言與此前的唐代語言進行歷時的比較研究，我們就會發現它們之間的變化已非常明顯，而與元明以後的語言相比較，它們的差別反而要小一些。

宋代語言屬於漢語史的哪一個時期？這一問題涉及中古、近代漢語的分期。目前對於近代漢語的上限應該確定在什麼時期，學術界還有較大爭論，但是對宋代語言的歸屬卻比較明確。

王力先生把宋代語言截分為中古末期、近代初期。在《漢語史稿》中他認為：“公元4世紀至12世紀（南宋前半期）為中古期，公元13世紀至19世紀（鴉片戰爭）為近代時期。”^①這就意味着宋代語言橫跨了漢語史的兩個時期。

王力先生在同書中提出判別中古漢語的標準是：（1）形尾“了”、“着”的產生。（2）完整的“被”字式被動句的普遍應用。（3）去聲字的產生。近代漢語所具備的語音特點是：（1）全濁聲母在北方話裏消失，（2）-m尾韻在北方話裏消失，（3）入聲在北方話裏消失。

儼若我們用王力先生的標準去衡量宋代語言，北宋時代的語言顯然不能滿足近代漢語的標準。據周祖謨先生考定，北宋時代汴洛語音的聲母與《廣韻》音系相比，已經大大簡化，全濁聲母已經歸入相應的清、次清聲母；但是韻母尚未徹底簡化，依然保存着-m、-p韻尾系列，這與王力先生提出的語音標準的後二條是不相吻合的。那麼，南宋時代的語音狀況是否有所改觀呢？在南宋人的音切中-m、-p韻尾仍然自成系列，朱熹《詩集傳》的叶音系統代表了南宋時語音的實際情況，我們在朱熹叶音反切中

^① 《漢語史稿》上冊 35 頁，中華書局，1980 年新一版。

還可以找到其獨立存在的證據。可見無論是在北宋，還是南宋的語音都不能完全符合王力先生的標準。

而且，王力先生所提出的中古漢語分期的標準是綜合考慮了語音、語法諸多的因素，而對於近代漢語却只是提出了語音的標準。按照單一的標準對語言進行分期是不可能完全反映語言的實際的。

呂叔湘先生提出了以晚唐五代作為近代漢語的上限，他說：“儘管從漢魏到隋唐都有夾雜一些口語成分的文字，但是用當時的口語作基礎，而或多或少攙雜些文言成分的作品是直到晚唐五代纔開始出現的（如禪宗語錄和敦煌俗文學作品），因此我們建議把近代漢語的開始定在晚唐五代，即第九世紀。”^① 按照呂先生的觀點，近代漢語的初始時期比王力先生提早了四百年，于是宋代語言自然就全部歸併到了近代漢語的範疇。

呂叔湘先生的觀點在後來得到許多學者的認同，如楊耐思先生就認為“語音、詞彙、語法三者的發展不平衡，所以近代漢語的上限與下限不能一刀切”，同意近代漢語大致上是“晚唐五代到清代的一千餘年”^②。

胡明揚先生 1986 年在上海舉行的第二屆近代漢語研討會上提出了近代漢語的初始期應為隋末唐初的看法，後來蔣紹愚先生也提出把近代漢語的上限定在唐代初年^③。這樣，宋代語言就更是從近代漢語的初期變為了中期。

近年來，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意見是蔣冀騁的觀點^④。他贊同呂叔湘先生的近代漢語始於晚唐五代說，並且充分闡述了其理

① 《近代漢語讀本》序，1984 年。

② 《加強近代漢語研究》，載《語文建設》1981 年 1 期。

③ 《近代漢語的上下限和分期問題》，載《近代漢語研究》，商務印書館，1992 年。又，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年。

④ 參見《二十世紀的中國語言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又，蔣冀騁、吳福祥《近代漢語綱要》“緒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由。蔣冀騁認為近代漢語的分期特徵是：

1. 語音方面：A. 輕唇音開始分化。B. 舌上音已開始與照三合流。C. 全濁聲母開始清化乃至消失。D. 入聲韻尾已弱化或開始失落。E. -m 尾開始與 -n、-ŋ 尾合流。

2. 詞彙方面：A. 更加口語化。B. 廣泛使用詞頭、詞尾“子、老、頭、打”以創造新詞。雖然“子、頭”已見于中古，而且使用頻率也比較高，但用法上還有一定限制，一般只能附在名詞後，而不能附在動詞、形容詞後。晚唐以後，纔沒有這種限制，如“叫子”、“望子”、“明頭”、“暗頭”。至于“老、打”用作詞頭，則是唐五代出現的。C. 雙音節詞大量出現，已開始接近現代漢語的雙音詞比例。D. 出現大量新詞新義。E. 出現大量外語借詞，有些已成為漢語詞彙的有機組成部分，一般人已看不出它的來源了。

3. 語法方面：A. 出現了新的指代詞，如“兒、奴、這、那”等。B. 出現了新的語氣助詞，如“了、哩、呢、那”。C. 被動句有了新發展，形式上新出現了用“喫”（吃）表被動的句式，用法上，可以引進詞組作為主動者，動詞可以帶賓語。D. 處置式也有了新發展，形式上除用“將、把”作處置詞外，還可用“捉”；用法上處置對象可以是詞組和名詞性短語結構。

蔣冀騁提出的分期標準考慮到了語音、詞彙、語法諸方面的因素，較為全面，用這一標準去衡量近代漢語的實際，儘管還有一些地方與上述標準小有不合，但總體上還是相符的。他提出的分期標準與宋代語言的實際相比較，就有了比較大的異同，這是因為宋代語言只是近代語言中的某一階段，只代表了近代漢語的初期，或者是中期的一些特徵，與整個近代漢語的狀況顯然是不一致的，我們認為這是很正常的一種語言現象。

在本書中，我們將宋代語言歸入近代漢語中期以前的範疇來加以討論。

二、宋代語言研究的文獻資料

研究古代語言，跟研究現代漢語有所不同：研究現代漢語除了依靠書面材料以外，還可直接分析現代人的口語材料；而研究古代語言，却只能依靠歷代留存下來的文獻資料。

書面語言的載體是文字。語言本來是一種瞬息即逝的東西，自從有了文字作為載體，語言就可以藉此而保留下來，這是文字的功勞。但是伴隨着文字記錄語言的功用的產生，却出現了書面語不能完全反映口語的矛盾，即所謂的言、文之別。尤其是漢語已經有了三千多年的歷史，在如此漫長的時間內，書面語與口語的對立不僅沒有得到彌合，發展到後來，二者的差別反而越來越大，分道揚鑣的趨勢更為明顯。如果說先秦時代的文獻的用語還能反映當時的口語的話，如《詩經》的“國風”記錄了民間口頭文學創作，《論語》記錄了孔子門人弟子的言談，發展到後代，一些文人寫文章往往沿襲和模仿先秦的語言，就與當時口語的差距極大了。

漢語史研究向來強調“文言”和“白話”的區別。“文言”是指先秦時代文獻中的書面語以及後代摹仿先秦書面語撰寫成的仿古之作；“白話”是指魏晉以來一些較為通俗的作品，它們反映出的語言較為貼近當時語言的實際狀況。以宋代語言為例，要研究宋代語言，我們就不能把宋代文人留下的文言作品作為基本依據，而應把目光瞄準當時的“白話”作品，以這一類作品中的語言材料作為研究的基礎。這一點是所有漢語史研究者的共識。

涉及宋代語言的有關宋代文獻，大致有如下幾類^①：

^① 本節論述參考了劉堅、江藍生、白維國、曹廣順《近代漢語虛詞研究·緒論》，語文出版社，1992年。

1. 佛教燈錄和宋儒語錄

佛教傳入中國是東漢初年的事。佛教的勢力，六朝時漸臻鞏固，隋唐時代有了更大的發展，形成了許多宗派，其中禪宗是在中國當時影響最大的一個派別。禪宗用所謂的“機鋒”來傳授佛學經義，其教學方式以師徒問答為主，對同樣的問題禪師可作不同的答復，對不同的問題禪師可作相同的回答，有時甚至用拳打、腳踢、棒喝的方式來啓悟學生。一些僧徒將這種師徒問答記錄了下來，就是禪宗語錄。禪宗語錄盛行于唐末、宋代，它們直接記錄師徒口耳相授的情況，所以這些語錄的口語化程度一般較高。

宋代僧人編撰的禪宗語錄主要收藏在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續藏經》等佛學叢書中。這種語錄又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以禪師命名的單行語錄，或稱爲續錄、法語、普說、偈頌，現存的還有 86 種^①。宋僧語錄中有少部分記載唐、五代僧家的授受，像《古尊宿語錄》、《六祖大師法寶壇經》、《雲門禪師語錄》，其餘絕大部分都記載了宋代僧徒的傳授。另一類是禪宗語錄的總集，即所謂的“傳燈錄”。釋道原編集的《景德傳燈錄》30 卷是這種總集的發軔之作，輯錄了唐、五代以來的禪宗語錄，共收禪師 1701 人。後來相繼又有《廣燈錄》、《續燈錄》、《普燈錄》各種名目，一直到南宋末的《五燈會元》，都是這一類著述，現存的“傳燈錄”有 7 種^②。上述禪宗語錄反映口語的程度也參差不一，有的非常接近口語，有的則沿襲前人套語，陳陳相因，同實際語言有較大距離。

儒學在中國傳統學術中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宋代儒學的特點是建立了所謂的“道學”，道學的創始者爲周敦頤、邵雍、張載，集大成者是程顥、程頤兄弟，號“二程”。到南宋時“道學”分

^① 參見劉琳、沈治宏編《現存宋人著述總錄》，巴蜀書社，1995 年。

^② 參考同上書。

爲兩派，一派宗小程，以朱熹爲首；一派宗大程，以陸九淵爲首。道學的思想一直影響着宋代以後的政治、哲學等學術領域。

宋儒除了著書立說以外，也進行大量的講學活動，官方、私家興辦的學校、書院在當時遍布于各地。老師對學生講授學業成爲日常的功課，而這種傳授是直接的交流，不能使用過于生拗的“文言”，往往使用較通俗的話語。學生們把講學或談話的記錄經過整理，刊刻成書，就成了我們今天見到的宋儒語錄。

宋儒語錄有一部分附在各自的文集中，也有一部分作爲專輯單刻印行。比較有名的像《二程語錄》（程顥、程頤），《上蔡先生語錄》（謝良佐），《和靖先生語錄》（尹焞），《朱子語類》（朱熹），《象山先生要語》（陸九淵），爲數不少。

2. 詩、詞、曲

這三類文體的作品是我們研究宋代語言的重要語料，但是由於它們反映口語的程度不同，其使用價值也不相等。

宋詩沿襲唐詩的路子發展，其數量巨大，宋詩涉及的一些句式、虛詞用法、詞語意義都是我們研究宋代語言的重要語料。但是宋詩沒有擺脫“文言”的約束，與口語有相當大的距離，像唐代王梵志、寒山子那樣純粹的白話詩，在宋代却没有出現。有一些宋人詩歌是介于半文半白的狀況，如邵雍《伊川擊壤集》中的詩即是。我們利用宋人詩歌中的語料，一定要進行鑒別揀擇。北京大學古文獻所編的《全宋詩》匯集了現存宋代所有的詩歌，可資利用。

詞是宋代最爲興盛的韻文體裁，宋詞的口語化程度遠遠超過宋詩，能够爲宋代語言的語音、詞彙、語法各個方面的研究提供充分翔實的語料，因此其語料價值也超過宋詩。唐圭璋先生編的《全宋詞》是收集宋代詞作最齊全的總集，可用來查閱檢索。

各種宋詞所包含的口語成分也不一致：有的作品中偶爾出現

白話語詞，口語成分不多，大部分宋詞都屬於這一類。有的宋詞通首處於雅俗之間，包含的口語成分較多，甚至全篇都以口語寫成。這類作品數量較少，但却值得重視，如黃庭堅、辛棄疾的部分詞，晁元禮、曹組的作品都屬於這一類。對於“雅俗”不同的詞，其語料價值是不相同的，我們理應區別對待。

與宋詩、宋詞相比較，更值得重視的通俗文學作品當屬戲曲。戲曲相傳是北宋藝人孔三傳創造的一種有說有唱的文學樣式，說的部分用散文，唱腔部分用宮調韻文。這種表演形式直接面對觀眾，因此需要它更能貼近民間口語，往往在一篇作品中幾乎全用俚俗語言，它的語料價值也就超過了上述其他作品。宋代戲曲流傳下來的不多，現存的北方戲曲（諸宮調）只有《劉知遠諸宮調》和金董解元《西廂記》兩種；現存的南戲只有《張協狀元》一種，研究者一般推斷為南宋時代的作品^①。

3. 筆記、小說

筆記這一文體起源于魏晉時代，一般認為南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是最早的文人筆記。唐代文人筆記數量大增，至宋代筆記的數量更盛，幾乎無一文人不撰寫筆記，粗略統計現存宋人筆記約 800 種，數量極為龐大。

宋代筆記所具有的語料價值主要表現在撰著者本人使用的語言和筆記中所記載的當時語言的狀況及變化。筆記的作者往往不刻意為文，文辭不求典雅，較為隨意，用語有時比較接近口語，含有一些白話成分。不過筆記中的白話材料大多是片言隻語，很少有成章成篇的，對於這些語料需要披沙揀金，着意勾稽搜集。其次，筆記所記載的內容極其駁雜，大凡稗官野史、鄉土風情、瑣事逸聞，以至于齊諧志怪，幾乎無所不包，而且有的筆記還有

^① 劉堅、蔣紹愚《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彙編》（宋代卷），商務印書館，1995 年。

考證辨駁，對方言俗語、音韻樂律、世俗用字都有較深刻的探討，這對於研究宋代語言是大有裨益的。比較重要的宋人筆記，像沈括的《夢溪筆談》、吳曾的《能改齋漫錄》、洪邁的《容齋隨筆》、程大昌的《演繁露》、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趙與時的《賓退錄》都是研究宋代語言的極好材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也有少數筆記保留了成篇的白話材料，這對於研究宋代語言更是彌足珍貴的語料。像王明清的《揮塵錄》收有岳飛部將王俊出首岳侯狀，記載他誣陷岳飛、張俊的經過，全篇都以白話寫成。《三朝北盟會編》附錄的《茅齋自叙》，記錄馬擴奉使金軍的歷程，也是用淺近的文言寫成，含有較多白話成分。

小說在宋代分爲文言與白話兩支。文言小說就是我們所說的傳奇。宋初編成的《太平廣記》是文言小說的輯集，不過它以收集漢魏六朝、唐、五代的小說爲主，也收有一些宋初的小說，對於研究中古漢語是一種很重要的材料，但是對於研究宋代語言的直接作用不大。宋人創作的傳奇，總體來看其數量不多，影響不大，語料價值不太高。比較有名的像《流紅記》、《譚意哥傳》、《梅妃傳》、《李師師外傳》等，也有一些作品散見于各自的文集中。

白話小說起源于古代民間藝人的說講故事——“說話”。說話這一伎藝在唐代已經出現，說話人所持有的說話底本，通常就稱爲話本。敦煌出土文獻中的《廬山遠公話》、《韓擒虎話本》是我們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話本。這一類話本用通俗淺近的文言寫成，其白話程度已經相當高，尤其在對話方面非常接近口語。因此話本比較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語言狀況。宋代城市經濟發達，出現了瓦子一類的娛樂場所，瓦子有各種伎藝表演，聽講說話是深受市民歡迎的一種娛樂方式。在南宋都城臨安，知名的說話藝人就有 90 人之多，並有小說、談經、參講、講說禪經、講史書

等名目^①。說話盛行，話本數量也為數不少，宋代羅燁《醉翁談錄》載錄的話本有 115 種之多，但是由于年深日久以及不受世人重視，宋代話本大多亡佚，現存的已寥寥無幾了。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一般認為是南宋時的話本，記載唐三藏、猴行者西天取經的故事，是後來的長編小說《西游記》的濫觴。這一話本在我國久已失傳，1916 年羅振玉借日本所藏宋刻小字巾箱本影印出版，後來又出版影印大字本，使之復歸故國。全書共分三卷，文字有殘缺。這一話本是研究宋代語言的重要資料。

可以確認為是宋人所作的白話小說目前尚未發現，倒是有兩種頗有爭議的宋代白話小說集本傳世，一種是明人洪楸編刊的《清平山堂話本》，收白話小說 29 篇；一種是由繆荃孫於 1915 年影刻的《京本通俗小說》，收白話小說 7 篇。《清平山堂話本》中的作品，經後人考證，有 3 篇為明人所作，其餘的篇章大概可以認為是宋人或元人的手筆，但在不同程度上經過明人刪改。《京本通俗小說》的作品，繆氏自稱其底本為“影寫元本”，但是後來的研究者以大量證據證明，這是繆氏的偽作，實際上是繆氏從“三言”裏面抽取出來的。既然其成書年代有疑問，那麼它的語料價值自然就要受到影響。實際情況是這兩種書把宋、元、明三代的語言資料攪和在一起了，我們在引用的時候必須予以仔細甄別區分。

說話有“講史”一類，一般認為是宋人所作的講史話本有《新編五代史平話》。但是現在有的學者也懷疑它是元人的作品，或是經過元人潤飾，在其中也有不少宋人語彙。

4. 文集

① 參見《武林舊事》卷一〇下，《夢梁錄》卷二〇。

文集是指收集個人文學著作的別集，宋人別集往往包括了詩、詞、文各種體裁的作品。詩、詞作品的語料價值我們在前面已有論述，這裏我們只對文集中的散文作品進行討論。一般說來，文集裏的白話資料都較少。現存宋人文集有數百種，大多都是以仿古文言寫成的，不能真正反映宋代語言的實際。但是也不排除文集中偶而使用某些句式、某一詞義，反映出當時語言的變化，如果能將這些支離零散的材料勾稽排比，分類羅列，也可以為語言研究提供佐證。就宋人文集所收各種文體的作品而言，其中書信、教學講義、家乘、雜記文等類的作品，行文比較隨意，出現的白話成分相應地要多一些。教學講義的語料價值已在前面論及，此處不再贅述。像宋人書信中屢屢出現“不宣”、“呵呵”、“萬福”；“見”作為表示稱代作用的副詞，與六朝時代相同。這些現象都是研究宋代語言應予關注的範疇。另外，一些文集還收錄了公文奏疏、官府文榜，往往轉錄百姓申訴狀，或告諭百姓應當知曉某些事項，行文時也帶上了一些口語成分。如司馬光文集有《議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狀》、《乞不貸故鬪殺札子》^①，其中涉及當事人的供述，基本上都是用白話記錄的。這些語言材料應當引起研究者重視。

宋人文集數量巨大，不易收集，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纂的《全宋文》將宋人文集作品盡數收羅，為宋代語言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5. 字典、韻書

字典、韻書在古代屬於“小學”類著作。從現代語言學角度看，它們分屬於詞義、語音兩大門類。

訓詁著作的始祖是《爾雅》，後來歷代都有依仿《爾雅》體

^① 分別見四部叢刊初編本《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三八、卷四八。

制編撰的各種訓詁專著。古人編撰這些著作的目的主要是解釋典籍中的字詞，以便學者更好地研習經籍。由于這些著作是後人爲前代典籍作注釋，因此在解釋中就難免不帶有作者時代的語言特徵。我們通過對這些材料的排比分析，就可以發現不同時代的語言的發展演變。宋代的訓詁專著數量不多，現在存世的就更少。以“雅”命名的訓詁專著，至今還保存完整的有陸佃的《埤雅》、羅願的《爾雅翼》。這兩本書仍然是以解釋古代儒學典籍的詞語爲主，涉及宋代口話的地方不多，而且其訓釋方法受王安石《字說》的影響，以“字各有義”的原則拆卸形聲字，解釋名物詞語的“得名之由”，有很大的隨意性，疏誤不少。後來的研究者都不太重視它們。分析字形、字義的小學類著作有陳彭年重修《大廣益會玉篇》、司馬光《類篇》、戴侗《六書故》等，它們同樣具有解釋字義的作用。

宋代有一些著作專門討論常用語彙的意義，並尋找該詞語在古代典籍中的用例，以此來證明“俗語不俗”，可以算是小學類著作的別支。像現存的佚名氏《釋常談》三卷和龔頤正《續釋常談》三卷，就屬於這類著作。它們着眼于“俗”，儘管其取材仍然是前代文獻，但是畢竟與當時的實際語言比較貼近，其語料價值顯然大于上述專門注釋經籍的著作。而且這類著作開創了研究俗語的先例，以後的元、明、清各代相繼都有解釋通俗詞語的著作問世。

韻書包括按韻編排的辭書，如《廣韻》一系列的韻書，以及韻圖。宋代是韻書大量發展的時期，官方、私家都致力於編纂各種各樣的韻書。這與宋代實行科舉考試，將詩、賦作爲考試內容密切相關。應試舉子爲了不犯韻需要研習韻書，朝廷爲了避免考生押韻不準確，需要建立統一的審音規則，于是以官方名義修訂頒布了各種韻書作爲正音標準。《廣韻》一系列的韻書實際上是分韻編排的字典，它們具有正音、釋義的雙重功用。現存的宋代韻書

主要有：陳彭年重修《廣韻》五卷、丁度等編《集韻》十卷、毛晃編《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五卷。這一系列韻書在語音上仍然遵循《切韻》的語音系統，按照二百零六韻（或是略加歸併，爲一百零六韻）分韻，與宋代語音的實際存在較大差距，不能如實反映宋代的語音狀況。但是這些韻書又並非全部照抄《切韻》體系，在某些方面又作了一些更改，如合併窄韻，規定獨用、同用類例，增加某些字的異讀等，或多或少反映了宋代語音的演變。我們研究宋代語音，這些韻書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材料。在釋義方面，這些韻書除了羅列古義訓以外，也增補了不少內容，增補的內容往往是某一詞語的新義，對於我們考釋語義不無裨益。

金人韓道昭所編《五音集韻》15卷，是一部極有價值的韻書。韓道昭是金代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該書成于金崇慶元年（1212）。它完全打破了《廣韻》分韻的格局，依據北方話語音的實際，將二百零六韻重新歸併爲一百六十韻。由於它是按當時的語音實際而作的歸併，因此這種分韻也就代表了北方話語音的體系。

等韻學興起于宋代，韻圖的產生使語音的審定更加嚴密。韻圖採用圖表的形式來闡明韻書中反切所表示的語音，按韻書的反切分圖列字，把各種字音歸納爲“四等”，提出了等、攝的概念，與後代的“四呼”相類，標志着宋代語音學的發展。現在存世的宋代韻圖主要有署名爲司馬光的《切韻指掌圖》、鄭樵的《通志·七音略》、無名氏的《四聲等子》、張麟之作序的《韻鏡》。韻圖對於我們研究宋代語音具有重要的作用，從韻圖的分圖，我們可以了解宋代語音韻部的歸併情況；從某字在韻圖中的位次，我們可以確定它的實際音值、等第，以及它與旁近字的語音關係；從不同韻圖對同一字的不同處理，可以探討宋代語音的發展演變，等等。

在“小學”類著作中，宋人爲古書所作的注疏也不能忽略。

作為研究宋代語言的材料，這類注疏的價值並不亞于字典、韻書，有的注疏的價值甚至超過上述著作。宋代學者幾乎為所有的儒學典籍作了注疏，這類注疏的現存總量不下一百種^①，如邢昺《爾雅疏》，陸佃《爾雅新義》，鄭樵《爾雅注》，朱熹《詩集傳》、《楚辭集解》、《四書集注》，孫奕《九經直音》都是當時比較重要的注疏。通過對注疏與原文詞彙、語音的對比分析，可以尋找出詞彙、語音演變的某些規律。例如朱熹的《詩集傳》、《楚辭集解》，由于朱熹是用當時的語音為上古韻文注音，所以研究宋代語音的學者都把注疏中的“又音”、“叶音”作為極為珍貴的語音材料，以此構建宋代語音的聲、韻系統。王力先生的《漢語語音史》的宋代部分就是利用朱熹“叶音”材料，勾勒出南宋時代語音的體系。

6. 史籍

史部書籍中的正史都出自朝廷史官之手，書中所用的原始史料大多經過史官的熔鑄改寫，失去了原有的面目，因此一般地說，正史裏保存的白話資料不會很多。但是正史中往往摘錄奏狀或人物對話，有時也會帶上口語成分。像“莫須有”一語出自《宋史·岳飛傳》，“爺爺”表示對人的尊稱出自《宋史·宗澤傳》、《岳飛傳》等，就是很好的例證。

較之正史，更應該注意的是實錄、會要、雜錄、別史、稗史等著作，這一類史書主要以保存原始史料為目的，因此往往有較多的口語成分，甚至保存有成段的白話語料。研究宋代語言，上述史籍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獻。這類著作中比較有用的有錢若水《太宗皇帝實錄》、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汪藻《孝慈淵聖皇帝要錄》、《靖康要錄》、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徐夢莘

^① 參看劉琳、沈治宏《現存宋人著述總錄》。